



博源文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马 勇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博源文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马 勇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马勇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6

(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ISBN 978-7-5097-4718-6

I. ①重… II. ①马…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8297 号

· 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

著 者 / 马 勇

出 版 人 / 谢 寿 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徐碧姗
赵 薇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王伟涛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7.6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262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718-6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中国自以巨大的落差遭遇现代性以来，至今已逾 160 年。在这 160 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直到中国经济突然爆发的最近 20 年。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 100 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在我们看来，这个警告也适合于今天的中国。

30 年前，正值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开始进行反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启蒙。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出版了《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这些丛书所传播的现代知识，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定式，为 30 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今天，中国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关头，如果说，当年的思想启蒙重在传播现代理念，为骤然而来的改革提供思想力量，那么，博源基金会作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则旨在集近 30 年来实践、研究与探索之成果，寻求对今天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共识。

“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项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寻求社会共识，是博源基金会的重点工作之一。而《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就是上述研究和讨论的成果。我们认为，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必须面对世界难题，重建我们的知识体系，这就形成了丛书的如下主题：现代性从何而来？中国是如何遭遇现代性的？当前中国为什么要提现代性转型？中国现代性转型的状况及其约束条件是什么？现代性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它是否还是一项绝对价值？是否存在“另类现代性”？各类国家现代性转型比较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如何选择适合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路径和模式？等等。

为了更好地体现相关学科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先后组织了不同学科的领军人物进行深入讨论；伴随着每一次讨论，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直接拷问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实际上，这些学术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丛书的边界，是不同学科对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思想认知、碰撞与交融，从而使丛书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让大家发挥各自的专业研究成果与识见，以期从不同角度勾勒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基本轮廓。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系博源基金会之“博源文库”的一个系列。本套丛书总序由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撰写。

博源基金会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编辑小组

2009年9月30日

总序

金耀基

博源基金会是由秦晓与何迪两位先生倡议成立的一个学术性团体，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秉持开放、理性、包容的精神，志在建立一个学术的平台。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说：“‘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为此，博源基金会在2008年提出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课题的基础上，于2009年3月的理事会上又提出了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的构思，指出：“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社会共识，应该成为基金会的重点工

作之一。”

我很认同博源基金会诸君的看法与价值理念。百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国族求生存、发展而起的各种变革运动中，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自强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包括清代“废科举，设学校”），到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1年国民党共和革命，1949年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一直到1978年开放改革所展开的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这一连串的变革运动背后，确有一股强烈的动力，那就是求国家之富强，求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但无可讳言，这一连串变革运动，不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自愿的或不自愿的，都在向“现代的西方”借鉴学习，向西方取经（应指出，社会主义也是西方的，它是“反西方的西方”）。从器物到制度到启蒙的价值理念（如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等）都一一进入中国。故百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乃至生活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造成的。百年来一系列变革运动实是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中国现代化。整体上，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过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亦即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程。我们应该强调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绝不仅是求国家的富强（经济现代化是而且仅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性，不多也不少，是指一个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传统的文明秩序（一个主要以儒学“三纲六纪”为规范的帝国秩序）已倾圮解体，而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还远远没有完全建立，今天仍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其意涵实远不止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也不仅是像美国反殖民的独立革命，还是

涉及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的文明形态的转型。

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的文明形态为参照系统的。150年前，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脱亚入欧，可说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范本而成为东方第一个现代国家。但值得特别指出者，日本的现代性之建立虽是以西方为范本，但是仍有强烈的日本文化的性格，故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日本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共相”，也有“异相”。无可否认，欧洲依启蒙运动建构的新文明形态是现代性的最早的个案。19世纪以后，欧洲一直被视为世界先进的文明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世界的“兵工厂”而转为资本主义“自由之堡垒”，亦自然而成为“西方现代性”之表率。但不能忘记，1917年俄国共产党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已在资本主义之外提供另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已形成一个挑战资本主义的世界力量。以俄国为领袖的苏维埃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更构成了冷战时代东、西对垒的两大阵营。依马克思原本的理论讲，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但在长期的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却是作为一种更优越的“现代性”（或曰“超现代性”）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挑战的，亦即社会主义是以拥有更优越的制度、价值的文明性向世界宣称的。诚然，社会主义所描绘之彼岸的自由王国的理想是无比浪漫动人的。恰恰因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比资本主义的也更大。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出现问题或异化，而“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冒进路线，更把中国推向亡党亡国的边缘，幸因1978年的开放、改革而转危为机。1991年，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不啻

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顿挫。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福山（Francis Fukuyama）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看法。他说那些可以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系统方案，已经彻底穷尽了，他说世界可能已到达人类意识形态演进过程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得到了普遍化，成为人类最后的政体形式。诚然，福山的论断具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性，须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不因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计划的“失败”而理所当然地取得终极的正当性。其实，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刻地暴露了西方现代性的黑暗面，美国先后涉足与发动的越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以维护自由与民主自居，却充分显露了霸道的政治性格，实不足以言为缔造全球政治秩序提供了范本。2008年10月爆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其殃源正在美国的华尔街，更透显了资本主义之经济秩序有深层的结构问题与道德性缺陷。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欧美思想界出现了一场激烈的“现代性论辩”，西方知识人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诚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作为西方现代性思想根源的启蒙运动的遗产，不是理性（Reason）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胜利，它不能导向启蒙思想家的希望（即普世的自由）的实现，而提出“铁箍”的警告。80年代的“现代性论辩”，循韦伯之思维，集中地表现为“理性的论辩”。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以济工具理性的不足，他是西方现代性的维护者，但他承认启蒙方案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我们可见到的是，西方的现代性依然在自身反思中逐步修正。我同意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L. Kolakowski）的看法，现代性方案是“处于永无止境的试验中”。

博源基金会，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并志在为知识界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平台，这个《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有幸得到多位知识界杰出学者的参与支持，各自独立地抒发其专业的研究成果与识见，欣赏敬佩之余，是为序。

金耀基

2009年7月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长时期独立发展。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所谓的“中国”，一直傲视亚洲，以“中央帝国”的心态对待周边族群和国家。到了近代，西方各强国以血与火的武力冲击，现代工业和资本输入的经济冲击，强势科技的文明冲击，强行进入中国。中国的面貌由此改变，传统的农业文明渐渐让位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中国人固有的生存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随着中国社会的改变而改变，渐渐告别传统，进入现代。短短几百年，中国的面貌近乎彻底改观，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渐渐拉近。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进入了中国，中国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当今世界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 录

一 西学东渐·····	001
二 文明中国再发现·····	013
三 “破门而入”的陌生人·····	029
四 中国为什么不改革·····	044
五 “跛足”现代化·····	068
六 宗藩解体·····	096
七 走进维新时代·····	115
八 外交麻烦·····	131
九 激进主义及其失败·····	158
十 由内政而外交·····	198
十一 新政：政治变革不归路·····	237
十二 中国革命兴起·····	270
十三 改良输给了革命·····	278
十四 接续宪政往下走·····	294
十五 鬼迷心窍的帝制·····	319
征引书目·····	327
编后记·····	334

一 西学东渐

大约 15 世纪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刺激了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竭力寻求海外贸易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明孝宗弘治十年即公元 1497 年，葡萄牙人瓦斯科·德·伽玛（今译达伽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之那塔尔。翌年，达伽马率领 4 艘船绕过非洲好望角，经印度洋抵达印度西南海岸之卡利卡特（加利库特），从而打开了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了哥伦布当年追求的目标。1511 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3 年后，他们的商船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

葡萄牙人的东来不是中国人和西方的第一次接触，早在汉、唐、宋、元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的往来和交流。只是由于双方政治格局的变动，这种交流已经中断了相当长的岁月。在这些中断了解的年代里，双方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因而葡萄牙人的这次东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极端重要的象征意义。此后几百年的中国历史演变，似乎都可以从这次接触中找到

它的最初起因。

40年后即1554年，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进入广东浪白澳。此后不久，他们又通过行贿的手段获得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开始和中国和平通商。毋庸置疑，这些西方人的主观目的并不局限在通商方面，而是为了在中国和远东掠夺财富，开辟新的殖民地。

踏着早期殖民者的足迹，西方传教士亦蜂拥而至。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是欧洲宗教改革兴起之后在天主教内部出现的一个反宗教改革的重要派别，他们为了弥补因宗教改革而兴起的卡尔文新教所造成的损失，竭力主张借助新航路的开辟向远东扩展势力，创建新的更大范围的宗教社区。

耶稣会传教士带着《圣经》和十字架在航队和大炮的护送下开赴远东，开始了他们向地球东半部传播“福音”的艰难使命。1541年4月7日，耶稣会创办人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从里斯本启程，1549年8月抵达日本。在那里，沙勿略遇到了他前所不知的中国人，给他的传教事业带来了新的启示。他不仅注意到每当与日本人辩论时，日本人总是乞求于中国人的智慧，即使在涉及宗教以及行政方面的问题时也莫不如此；而且他发现中国人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特殊资质”，相信在中国人中间传播福音一定会比在日本人中间更容易些。这一意外的“发现”更加促成了沙勿略向中国传教的决心，“为了达到目的，沙勿略不惜借助葡萄牙人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支持。”^①1552年8月，沙勿略离开日本，抵达距广州30海里的上川岛。此岛当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的一个贸易

^① 本书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为方便读者阅读，正文中略去注释，请参考文末“征引书目”。

点，只有一片用树叶和稻草胡乱搭成的茅屋，条件十分艰苦。而且由于明政府此时困于倭寇的肆扰，复置浙闽巡视官，严禁外国人登陆。沙勿略来得实在不是时候，他在上川岛陷入困境，不久又害了一场热病，遂于同年12月2日病死该岛。

沙勿略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但他的努力与热情激励他的同道终于撞开了中国的大门。1557年葡萄牙人抢占澳门后，耶稣会便以澳门为据点，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皮莱士和戴西拉在澳门定居，卡纳罗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并选派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的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和利玛窦4名意大利耶稣会士到澳门，寻找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范礼安、巴范济先后在澳门死去。罗明坚于1582年得到广东地区行政负责人陈文峰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在肇庆天宁寺居住并正式传教，此寺“可称之为中国内地第一所耶稣会会院”。

和罗明坚同行到达肇庆的利玛窦，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与中国地方各级官员和文人学士交往，宣传欧洲文物和典章制度，并在叙述各国不同的宗教仪式时，适时加上中国人当时还不知道的有关基督教圣迹的叙述，他希望在短时间内以这种附有感情的方式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中国。由于利玛窦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使他在解释中国人尚不知道的那些东西时，轻而易举地震慑了中国人。特别是他关于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无数海陆地带的解释，有效地减轻了中国人对欧洲人的恐惧，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与欧洲的交往除了文化的交流与互补外，并不会造成类似于倭寇的灾难。在这之后，利玛窦又用铜和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而且使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利玛窦是一个善良的人和有学问的人。“当时都中缙绅，交许可其说，投刺交欢，倒

屣推重，倾一时名流”。

利玛窦在肇庆的成功，尚属个别现象。大多数耶稣会传教士只限于在东南沿海一带活动，而且，他们既然是为了传播基督福音，就必然受到儒家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以至有些传教士不得不哀叹道，倘若没有军舰和大炮的帮助，他们对中国人便一个也不能教化——两种文明的冲突从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里传教，如果一味仰恃武力，那么不论多么强大的战舰，多么声势浩大的军队都难以真正奏效。要想在中国立足和传播福音，他们就只能像佛教徒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借助于中国固有的智慧资源和文化形式，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在政治上维护中国君主的统治，在生活习惯上灵活地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坚持和平的传教路线，以显得高雅的文化和文明水准赢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以此减轻中国固有文明对基督教文明的敌对意识。

在这种和平传教路线的指导下，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较系统完整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科学文化，客观上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不必否认，他们介绍的西学具有极强的宗教意识和时代局限，在相当程度上是把一切知识作为神学的“婢女”传入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中国人介绍的那些科学知识，在根本出发点上“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他们极少介绍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人文主义和实验科学为主要内容和特点的西方新学，而侧重于介绍以神学为主体的所谓“六经籍”。

当时的西方自然科学正在突破中世纪的神学樊笼走上近代的道路，已经获得或正在获得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成就，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刻卜勒的行星运行

三大定律、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力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和演绎法、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学、波义耳的新元素说以及塞尔维特和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等等。然而，对于这些进步的学说和划时代的成就，明末清初的来华传教士或只字不提讳莫如深，或尽管有少量的介绍，不仅支离破碎语焉不详，而且时间相当迟。致使后来的一些中国人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这些内容之后，不禁愈加怀疑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动机和目的。不过，从利玛窦们的立场出发，这些传教士身为教会中人，以上所述之新学说在当时的西方不仅尚未定论，而且几乎一律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邪说”，这些服膺教廷的传教士们当然不会向中国人传播这些“异端邪说”，而只会传播那些他们认为是“经典”的稳定而几近保守的文化。

有鉴于此，后人似不应苛求明末清初那些来华的传教士们，他们能将托勒密的地心说、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静力学、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和逻辑学以及盖伦的人体解剖学等西方古典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这些世界文明的积淀，仍有其积极的意义。而且从主观意图而言，那时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如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还是试图站在欧洲学识的高峰上，向东方介绍西方学术的最高水平，他们曾常让其家乡人把欧洲科学上一切重要的新事物，向身在中国的他们邮寄，以介绍给中国人。由此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北京，神父们在纠正中国人在天文方面的错误，而在罗马，教廷圣职部直至1882年还坚持对哥白尼学说的判决。”平心而论，当时的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大多关心欧洲自然科学的新进展，并在尽量不违背基督教教义和教会规定的情况下，适时介绍过不少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成就。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们，一方面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